

文史杂谈

洪洞县的大槐树和老鹤窝

曹世忠

孩提时代,上年纪的人常说:“咱是山西洪洞县老鹤窝底下的人,这不可能忘。”长大了又听到有人唱“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鹤窝。”才知道数百年来,这首歌谣在整个河南、山东、河北、安徽,乃至半个中国妇孺皆知,被祖辈代代相传。

自宋朝灭亡后,中原地区接连发生水、旱、蝗、疫四大灾害,以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到了元末,虽结束了多年来的兵灾,但天灾却使中原之地“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墟”。于是,统治者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开封就由上府降为下府。明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锐减直接威胁明朝统治。“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朱元璋迅速采纳胡瑄、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人的奏议,实施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见明太祖实录》、顾炎武《日知录》等)。

也许是地理位置的因素所致,元末明初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故那里的大部分地区社会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再加上邻省难民不断流入,使其人丁兴旺,而当时的洪洞县又是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于是,它自然就首当其冲,成了统治者向中原地区移民的必选之地。

据山西《洪洞县志》以及洪洞县《大槐树志》史料记载,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涉及十八个省的四百九十多个县市的八百八十二个姓氏。明永乐年间,当地官府曾七次把泽、潞、沁、汾和平阳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人多地少的百姓集中在大槐树左侧的广济寺,把他们迁往中原一带。当权者制定出“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同姓同宗者还不能同迁于一地的条律,致使好好的一家人(移民)被拆得七零八散。为了能和亲人迁到一处,好多人不得不改姓氏。迁徙途中,有的移民因恋家而半路逃跑,被追回后要受到割去耳朵,或在脸上用刀划成标记的严厉惩罚。

广济寺旁有一棵大槐,树身数围。官府人员在槐树下为迁徙者办理手续,登记造册,按所去地点编队,并给予一些耕牛、种子和路费。尽管如此,依然给当时的移民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几十年甚至以后的几代人心中都难以愈合……

被迁者拖儿带女,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时,凝眸古槐,耳闻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鹤不断地发出凄楚的哀鸣,想着自己这一去再不能返回故土了,触目生情,不禁潸然泪下。为了让子孙永远记住自己的家乡,老人就指着大槐树和上边的老鹤窝给孩子们说:“以后若能回到家,忘了咱村庄的话,就先找这棵筑有老鹤窝的大槐树,然后再慢慢找回自己的老家。”

又说:“记住到了任何一个新的地方,只要是从这大槐树的老鹤窝底下出去的人,都是一家人,要互相照顾!”中原地区少见老鹤而多见老鸱,后来就把“老鹤窝”说成了“老鸱窝”。

随笔

定阜街

祁建

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鲁迅在这里的演讲震动中华:“没有抗日的实践,怎知中华民族必亡呢?”鼓舞了多少青年人。1939年又成立了抗日组织“华北文教协会”。

著名的考古学家马衡,现代书法家沈尹默,文学家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美学家朱光潜等都曾经在这里教书。

著名的《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原形就是辅仁大学的文立征。1945年他在山东临城的一次突袭中牺牲,年仅34岁……

在美国的高能物理学家邓黎昌博士、放射药物学家彭勤海、英国的邓肇豪、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叶嘉莹、日本驻华第一任大使小川平四郎等,都是辅仁大学的学子。著名指挥家李德伦、作家萧乾、书法家启功等也都是从这里走出。

史树青、叶嘉莹、朱家溍、傅惟慈、来新夏、欧阳中石、张厚粲……这一系列的名字代表了辅仁大学的教育成就,也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教育取得的一些成功。1952年,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往事悠悠,岁月转瞬而去,人事已非,建筑依旧。近百年的风雨悄然而去,人们到这里也许是为了回忆昨日的青春,寻找沧桑的足迹。

中午,是最自有的时间,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沿着柳荫街到什刹海溜达一圈。

附近的郭沫若纪念馆、梅兰芳故居……都是用中午时间“走的”。一个人漫步在郭沫若纪念馆,穿过长廊,看着那些老照片,像自己也走进那个时代。经常在故居门前的马路散步,顺着高墙走,路边经常有好多蹬三轮的师傅在聊天,在灿烂阳光下,下棋、侃

山,或者眯上一觉,等客人来。

郭沫若故居的金字门匾由邓颖超题写,大门里一条小径直伸到一座坐北朝南的垂花门前。在这占地7000多平方米的庭院式两进四合院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院子里的10棵银杏,在秋日午后的暖阳中舒展着它们闪亮的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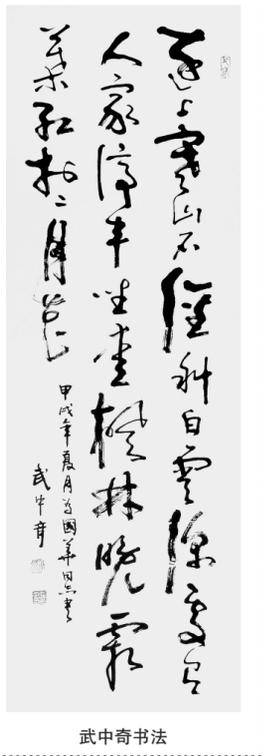
绿茵中一对石狮游玩嬉戏,正是主人的不拘一格,才使它们没有站在大门外显示力量,而是轻松活泼地蹲在草地上。与石狮遥遥相望的是垂花门前两口不成对的铜钟,一左一右,和门前两株古柏相伴为伍。稍高一点的一只铸于明天顺丁丑年,另一只铸于清乾隆甲子年。它们都是郭老的收藏。

郭沫若铜像悠然自如地坐落在枝叶纷披的银杏树下,它穿越时空,留下了一个文化先驱的姿态,似在沉思,又似在与前来的朋友倾心交流。

而梅兰芳的故居,则是经常关着大门,冬天甚至就不迎接客人。记得有几个夏天,走进那个院子,门口的几间展览着梅兰芳的生平历史图片。我带着几个同学参观过,被它的艺术氛围深深感动。

还可以到附近的十三中逛逛,它以前是辅仁附中男生部的校舍。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就曾在十三中任教十多年。他的成名作《班主任》也许是取材于他教师生涯中的感受吧。

我一直认为定阜街是北京“文脉”之一,狭长的小巷两旁遍种槐树、柳树,秋天北京的阳光落下细碎的影子,踏上去有点飘忽。附近的什刹海烟水苍茫,堤岸曲折,杨柳依依,雕栏画栋,也有卖旧书画的,有卖古玩的,有老人在拉胡琴唱京戏的,百余年风雨沧桑,在这里充满着老北京一切迟缓、悠长的感觉。



武中奇书法

知味

“酒媒人”猪头肉

张光恒

猪头以前仅在祭祀时使用,后来用卤煮好的猪头肉做成的冷盘,竟成为“好菜一碟”,是约定俗成的下酒佳肴,有“酒媒人”之称。

老家地处鲁南,其地的猪头肉和南方的红烧、酱焖猪头肉不同,是以卤煮为主的,就称卤猪头肉。在老家滕州,能看见不少挂有“香酥猪头肉”红布招牌的电动小三轮。摊主会根据猪头部位的不同来要价,其中最贵的是猪耳朵和猪舌头,其次是猪嘴部位(也叫“猪前脸”),其余部位的价格,就相对便宜点了。

煮好的猪头肉,其里的脂肪,经过长时间烧煮早已溶入水中,吃了不光不会造成血脂高等疾病,相反还有补虚、养血、润燥等功效,所以,不必有吃猪头肉怕损健康的担忧。你指定好所要的猪头肉部位,摊主一刀子下去,只见猪头肉白闪闪的肥肉膘子里,裹着些许瘦肉肉疙瘩,而那些瘦肉疙瘩里,又掺杂着几丝肥膘,瘦、肥肉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挑一块放进嘴里,即刻化掉,一抿下肚,香、烂、软、糯的味道马上灌满口腔。而小孩特喜欢吃那猪耳朵,因为它是两层皮夹裹着一层脆骨,吃起来干脆脆脆,嚼劲十足,猪鼻子、猪舌头干脆分不清肥瘦,嚼起来是劲道筋道,这些,品一品都能“醉了”,叫人难以忘记……

我家邻居王二大爷卤猪头,程序烦琐得很。他买来生猪头,先把柏油块烤热,发软后,用其黏性去除猪头毛,然后把火通条烧红,烫去剩下的毛茬子。随后,将猪头劈开,削去耳根、淋巴等不能食用的部分,切成大块,放入清水锅中,加入盐、花椒、大料后,用豆蔻料生火慢慢炖煮(这种烧肉烧起来火力稳定,猪头熟得均匀)。如何判断猪头肉熟透呢?王二大爷自有方法,他用筷子穿猪头,如果不费力地穿透了,就表示行了。

每次看到王二大爷用热气腾腾的刚出锅的馒头夹半个猪耳朵,嚼得咯吱咯吱响个不停,老脸绽开菊花,仿佛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享受无比……

新书架

《华夏文库》

萧红

《华夏文库》是一套大型普及读物,主题为全面系统介绍阐述中国古代文明。文库规划为2000种左右,大体分为儒学、佛教、道教、文学、历史、经典解读、艺术、科技史、民俗等14个系列。

《华夏文库》项目2013年启动,迄今已出版儒学、佛教、民俗、经典解读书系100多种图书。《华夏文库》的特点是专家学者写小书,每种书选取很小的一个点原创撰写,以现代学术眼光、研究能力,去总结、解读、梳理古代中国文明,最后这些点会组成面,让读者能系统瞭望古代中国文明的全景。

文库图书内容追求知识准确,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定位于普及阅读,面向中等教育以上的大众读者,深入浅出,图文并茂。

茶百戏能使茶汤汤花瞬间显示瑰丽多变的景象。若山水云雾,状花鸟鱼虫,如一幅幅水墨画,这需要较高的沏茶技艺。宋代,茶大都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喝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难度较大的茶百戏,流行的范围比较窄,一般只流传于宫廷和士大夫阶层,底层百姓掌握这种技艺的少之又少。

说到斗茶,不能不说茶盏。宋代盛行斗茶,所用茶具为黑瓷茶具,产于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福建的建窑盏,即著名的“建盏”。因其色黑紫,故又名“乌泥建”“黑建”“紫建”。建盏中以兔毫盏最为人称道。兔毫盏釉色黑青,盏底有放射状条纹,银光闪现,异常美观。以此盏点茶,黑白相映,易于观察茶面白泡沫汤花,故名重一时。蔡襄《茶录》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紺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

宋人斗茶之风的兴起,与宋代的贡茶制度密不可分。民间向宫廷贡茶之前,以斗茶的方式,评定茶叶品级等次,胜者作为上品进贡。

古人斗茶的一些技法已难觅踪影,可我国大部分产区,仍能看到古代斗茶的遗风。有的“斗茶”大会上,还会奏起古乐。心随弦动,古乐空灵,茶香袅袅,反映了中国茶文化的精深与历史的源远流长。

绿丛杂俎

斗茶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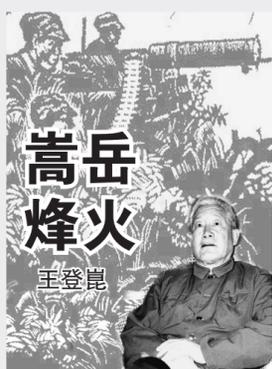
董国宾

点茶、点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点茶、点汤、指茶、汤的调制,即茶汤煎煮沏泡技艺。点汤的同时,用茶筴旋转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称为击拂。反之,若汤花不能咬盏,而是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即露出“水痕”,这就输定了。水痕出现的早晚,是茶汤优劣的依据。

斗茶令,即古人在斗茶时行茶令。行茶令所举故事及吟诗作赋,皆与茶有关。茶令如同酒令,用以助兴增趣。

茶百戏,又称汤戏或分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即将煮好的茶,注入茶碗中的技巧。在宋代,茶百戏可不是寻常的品茶喝茶,有人把茶百戏与琴、棋、书并列,是士大夫喜爱与崇尚的一种文化活动。宋人杨万里咏茶百戏曰:“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连载



嵩岳烽火

王登崑

支枪虽然都是各色各样,有套筒枪、有高标尺的、有汉阳造的,但都是打“79”子弹的好枪。我领回枪以后,孟庆炎同志也来了。他说:徐合亭同志的伤已好了。调到你们区干队任副队长,你们一起回去。之后他又说:据可靠情报,敌人可能要向我支枪虽然都是各色各样,有套筒枪、有高标尺的、有汉阳造的,但都是打“79”子弹的好枪。我领回枪以后,孟庆炎同志也来了。他说:徐合亭同志的伤已好了。调到你们区干队任副队长,你们一起回去。之后他又说:据可靠情报,敌人可能要向我

敌情,准备反扫荡。如有什么情况与县里联系。

13条枪加上张治中同志来时扛的一支共是14条步枪。在回来的路上,我和张治中同志年轻些,一人背5条。徐合亭同志年纪大些背4条,翻过山回到了南冶上。

区干队的同志看到我们背回了这么多枪,都高兴得跳了起来。特别是那些还没有枪,背着大刀长矛的同志,抓到枪后谁也不舍得放下来。

宋金海队长和项副政委把枪登记后,发给同志们。项副政委说:我当了十几年兵,看到队伍发展,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枪来武装自己,还没有看到过上级发枪扩大武装的。这次上级给我们发了13支枪,说明上级领导对我们三区的关心,同时也说明了三区这个地方发展民兵武装的重要。这些武器都是八路军老大哥拼命从敌人手中夺来的,这些枪来之不易呀!我们要握紧武器,狠狠打击敌人,以报答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同时,我们也要从敌人手中夺取武

器,不断扩大自己的武装。大家听了都拍手拥护。

根据敌情,我们积极准备反扫荡。区干队的枪有20多条了,子弹太少是个大问题,把仅有的子弹平均分配七九步枪,每支枪只有几发子弹,几支三八式枪的子弹多点,每支不过10来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动群众,大家想办法。国民党溃退时丢下不少枪支弹药,这部分武器大部分都散落在群众手里,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手里的子弹献出来打击敌人,子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回本村召集群众讲明了情况后,这家3发,那家2发,很快就收集了100多发。其他同志也收集了不少子弹。这样,我们每支枪平均就有了30多发子弹。

1月底的一个夜晚,我们回到南冶上村,情报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东面25里白沙镇,北面25里的芦店镇都来了很多日本军队和伪军。宁县长来信中也有,一大批日本军队已到了登封城。芦店、白沙也都驻扎了很多日军,大有向我县根据地合围之

口和路口上都布上游动哨。10个保的70多个村都派有代表。治上、石门沟、水峪、烟庄、曲河、马窑、豹沟等较近的村庄有不少群众都自动赶来参加。会上我代表三区的领导讲了话,号召各村把民兵、农救会、儿童团迅速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保卫家乡,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最后号召青年积极参加区干队。

会后形势发展很快,几天之后,区干队的人数就增加了20多个人。各个村庄,特别是颍河以南的村庄,青年人都纷纷报名参加了民兵。

大约在1月20日,三十五团住在马峪川徐庄,通讯员送来通知,叫我去汇报工作情况。于是我就和张治中同志赶往徐庄,见到了三十五团的政委兼冀山区工委书记马毅之同志。我向他汇报了这一段的工作情况。汇报时,我说区干队已有了20多人,就是枪少子弹不足。首长们都很满意。马政委说:你们要放手发展武装力量。你们区的主要

斗争对象是大冶的杨香亭、刘光华,他们有几百人和枪支,没有武装力量在这里是打不开局面的,力靠主力部队不行,主力在这里打一下就走了,你们还是站不住脚,要想长期稳扎脚跟,就要迅速把区干队、民兵壮大起来。没有武装力量,张老六、卢黑鬼也不一定买你们的账。最后他说:我们这次在密县消灭了一股“别动队”,有300人,就是去年秋季来登封冒充八路军、抢救老百姓的那股部队,缴了不少好枪。你去找王团长,让他们把替换下的枪支给你们一些。

我听说后,马上找到王成汉团长,向他汇报了区队发展了20多个人,但是有10多人没有枪支的情况后,他慷慨地说:你来得正好,正准备要给你们几支枪。我说:你们这次缴获了200多支枪,只给几支太少了。他说:部队发展很快,也需要枪。我想了一下,他又说:你不是说十几个人没有枪吗?到底十几个?我说:13个。王团长说:给你13支,满意吧?我听说后,没等吃午饭就把枪领了出来,一看,13

8.火烧韩卓如

三十五团开赴前线打仗去了,只留下三区的几个人、几条枪。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我们白天在各地活动,夜晚的住地常常要换两三个地方。我们向各村发出通告:决定于1月14日在南冶上召开庆祝三区成立大会。

当时,区里只有9个人,其中有5名战士、4名干部。干部除了我之外,还有从主力部队调来的项云山同志,他担任区队副政委,宋金海同志任区队长,牛得安同志任武装助理员。战士是从秦子高的队伍中争取过来的,有张治中、李奎五、牛正等。白天由5个战士轮流放哨,夜里则加上4个干部,共有9个人换班站岗、轮流休息。就这样仅9个人、7条枪,开庆祝大会时,连警戒都顾不过来,怎么办呢?

于是,在开会的前两天,我便给一区的李纯如、郭渊博、孙永3位同志写了封信,请他们届时援助。收到信后的当天夜里,郭渊博和孙永2同志便率领一区队赶到了三区。到开会那天,他们在冶上的山神庙、山沟